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文学气象与民族精神

20世纪陕西地域文学审美形态

冯肖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文学气象与民族精神

20世纪陕西地缘文学审美形态

冯肖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气象与民族精神: 20 世纪陕西地缘文学审美形态 / 冯肖华
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7-5004-9116-3

I. ①文… II. ①冯… III. ①当代文学—文学研究—陕西省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9206 号

责任编辑 刘志兵
责任校对 王雪梅
封面设计 毛国宣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75	插 页 2
字 数	316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悉心指导与受益提升

《文学气象与民族精神——20世纪陕西地缘文学审美形态》一书，是我主持完成的200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该成果经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通讯专家鉴定以良好等级结项。这不仅意味着几年苦著得以圆满而如释重负，更是我学术生涯中受益终生的一次历练与提升。

关注陕西文学，是我近五年间学术视野的一个微调，即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向地域文学延伸，从文学本体性研究向地缘文化论域拓展。其实，在此领域中，诸多前辈、师长及同道佼佼者已是著述高筑，成果斐然，其传承濡染于我受益匪浅。在本书完成过程中，特别是初成后的数次就教求正，都曾得到同道学者们真诚文字的悉心指导和热情话语的恳切激励。著名地缘文化研究家崔志远教授，从地缘文化的高度认为：“新时期以来，伴随寻根文学的出现，从地域文化的视角研究文学的地域性是一个新突破。这部著述正是在此基础上以较大的气魄从姜炎文化、周秦文化、汉唐文化、延安文艺的渊源传承上思考陕西文化的地域特征，并进而思考与20世纪文学的相互联结，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思路。所涉及的陕西地缘文学的诸类问题，既有纵向的考察，又有横向的剖析与阐释，内容丰富，使著述具有填补该地域文学空白的性质。同时，从论证中可明显感到，研究者对陕西文学很是熟悉，不仅资料较为丰富，而且论断准确得体，如对‘本体形态’、‘价值体系’、‘作家传承’、‘格局建构’等内容写得颇有特点，多有新见。”与此同时，崔先生还语重心长地指出：“陕西地缘文化的丰富内涵如何？这些内涵与他省区有何不同特征？20世纪陕西文学的独特性如何在地缘文化的基础上形成？这些焦点问题有待拓展思考。”先生的指点对问题的后续深化

提供了新的思路。著名文艺理论家李西建教授就地域文化与民族精神何以融合的问题指出：“作者从 20 世纪陕西地域文学的本体形态入手，对这一时期陕西文学的总体面貌与民族精神间的关系作了较深入的思考，既有历史纵深感，视野开阔；又能着眼于空间呈现——即地域状貌所赋予的文化烙印与痕迹的分析与阐释。可以说，较之同类研究而言，无论从命题的新颖性，还是从立意的广度与深度方面都有一定的开拓，故创新性是较为突出的。作者问题意识突出，解决和思考是系统的，十个层面多角度的透视与观照，使问题的思考更加深入与细致。尤其从一个较新的视角系统分析了 20 世纪陕西文学的整体面貌以及与民族精神的关系，这就具有了一定的哲学视野与理论价值取向，所以本著是对现有研究成果的提升与丰富。陕西文学的研究需要从更宏观的历史语境与地域特征方面进一步拓展，以超越目前即兴式、就事论事、单个评论式的研究状态。该著给我们以新的启示，是对目前研究现状的有益补充与整合，故有应用价值和学术价值。”李教授学术造诣很深，从高要求指出了很有见地的意见，希望“进一步挖掘地缘文学与民族精神之联系，强化这方面的思考，使陕西文学的深层价值得以彰显”。寥寥中的之言，使我受益匪浅。著名唐代文学研究家李浩教授，近年来在关陇士族文化方面的研究颇有建树，对拙稿的透视更有着类同亲缘之感。认为：“从地缘特征牵引出广阔的关联论域阐述陕西文学，在方法论上有较高的创新性。书稿突出特色体现在，著者没有陷于以往文化模态的‘外部结构’或生硬框套陕西文学的‘内部结构’之中，而是将重心自觉置于后者，并有效地提炼出 20 世纪陕西文学的本体形态、整体景观、价值谱系等框架，论点清晰，言说有据，具有较为成功的史著化特点。同时，不乏新意之处是有效地梳理了‘姜炎文化—周秦文化—汉唐文化—延安文艺’这样一条地缘文化/文学的历史生成谱系，以此为背景进而建构 20 世纪陕西地缘文化诗学，使之具有较高的理论深度和广度，并明显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学的渊源、文脉，对陕西文学研究而言，具有较高的开拓性、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书稿论及陕西文学价值体系、人生样态、人文关怀、审美风格，能够深入腠理，繁略相宜，多有发人未发之处。”李浩教授谙熟陕西地域文学研究现状，深有感触地指出：“陕西地缘文学这个课题，涉猎的研究专家很多，都没有形成大的气

候，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研究人员极少，二是大部分人只凭一时热情而为之，因此，成果稀少。冯肖华教授的项目研究却取得了不少独到成果，对前人的成果有很大的超越，特色鲜明，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如进一步深入下去，将对陕西文学研究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很显然，恳切的话语不仅是对我学术方向的有效点拨，更是对我学术信念的激励。研究陕西文学，在省内有许多造诣很深的行内学者，著名文艺理论家段建军教授对书稿给予了应有的指导。认为：“陕西文学在中国文学格局中具有鲜明的地缘特色，陕西文学自身也因陕北、关中、陕南的不同，使作家的创作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点。作者抓住陕西文学的突出特征，旨在建构一个地域文学新学科，并且大胆阐述了自己的地缘文学学科构想，不仅对研究陕西文学，而且对研究中国广大领域中所有具有鲜明地缘文化风貌的文学，都有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所以是一项创新程度高、特色突出的成果。作者能够把陕西当代文学的创作，纳入到久远的历史之中，与远古的姜炎文化、古代的周秦文化、现代的延安文艺相连通，赋予了当代陕西文学深广的历史维度，突显出陕西文学所彰显的民族精神，这就使得点与面、今与古、民族与世界有了较为妥当的联系，也突出了成果的名称‘文学气象与民族精神’。好的文学必然是通过地域特色，彰显民族精神的，由于具备人的气象，因而文学就更有质的精彩。这是书稿在大的构架上视野开阔、角度新颖、体系完整的一个学术创新。在对陕西文学的本体形态、病象把脉、重构格局等的论述上既切合实际，又入木三分，思路清晰，做到了轻重缓急有所区分，读来使人眼前一亮。让人们对于陕西最重要的作家作品的创作具有深入的了解，对次要的创作现象则有了概貌的了解，显示出逻辑严密和较强的理论力量。”末了，作为一直以来关注陕西文学研究的学者，段教授从书稿的学术性、针对性和应用性层面给出了他的判断：“我认为这是一项值得我们重视的具有较大价值的成果。”自然，其肯定无疑是有效的鼓励与鞭策。2004年，当我在主持完成陕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陕西地缘文学研究”课题时，著名现代文学研究家、贾平凹研究家韩鲁华教授就给予了及时的关注。觉得这种研究“是一种新的理论视野，在陕西文学研究上有着新的突破与创新，属于该学科研究的前沿。其突出特色和主要建树在于，勾勒出了陕西地缘文学的基

本理论构架，特别是对陕西文学基于地缘的本体形态学的理论建构和审美特征的揭示与归纳，这对于陕西当代文学乃至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具有着诸多的理论启示意义和实践意义”。韩教授殷切希望：“由于该课题学术含量较高，且需要进一步地拓展，建议以所取得的成果为基础，对陕西地缘文学做更进一步的拓展研究，或连续性研究。”可以说，正是上述同道资深学者们的悉心指导，激情鼓励和热切希望，才使得这项研究得以延续，使得这项成果得以后期圆满。

对于陕西文学的研究，其实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因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等的文学辉煌的存在，就吸引了众多批评家的眼球，如冯牧、严家炎、李希凡、胡采、阎纲、何西来等前辈的文学关注，其起点从一个高度奠定了陕西文学与共和国文学精神相依的应有品质。而在陕西学界也就自然形成了几代倾心关注、尽心研究本土文学、本土作家创作的学界称之为“思想库”的批评队伍，如王愚、肖云儒、李星、畅广元、刘建军、蒙万夫、王仲生等，以及后续新锐批评家白桦、李继凯、李西建、赵学勇、李浩、段建军、周燕芬、韩鲁华、冯希哲等。正如鲁迅先生所形容的作家与批评家之“厨师”与“食客”的关系那样，陕西学界有了这样以文学为经国大业的执著、热情、倾心呵护的“厨师”们，才使得文学在这块土地上尤为显得尊贵，尤为养人滋性，因而形成了文学神圣久远、作家代代不绝的深水静流的文学景观。这就是秦地黄土地文学——炎黄文明、周秦风采、汉唐气象、延安精神之上风上水土地文学品质的渊源烛照和传承。有了这一源远流长的文学热脉，作家代际师承的精神贵气，批评家殚精竭虑的理性扶持，陕西文学的多样与丰赡，博大与宏厚，锐意与创新之前景将是必然的！

冯肖华

于宝鸡文理学院

2010 年 5 月 23 日

目 录

导论 陕西地缘文学的学科构图	(1)
第一节 版图、文化、精神的鼎立	(1)
第二节 地缘文学与通观视域	(7)
第三节 史线边界与学科涵旨	(10)
第一章 陕西地缘文学的本体形态	(20)
第一节 本体形态特质通观论	(20)
第二节 区域形态异质特色论	(29)
第三节 文学样态地缘审美论	(37)
第二章 陕西地缘文学的历史生成	(47)
第一节 姜炎文化文明的地缘先导	(47)
第二节 周秦文化底蕴的地缘渊源	(50)
第三节 汉唐文化因子的地缘潜质	(58)
第四节 延安文艺新质的地缘延伸	(67)
第三章 陕西地缘文学的整体景观	(71)
第一节 文学与地缘:整体构合特征	(71)
第二节 文学与时代:史线构合特征	(76)
第三节 文学整体景观的价值确认	(81)
第四章 陕西地缘文学的价值体系	(86)
第一节 文学生态:价值取向的地缘特征	(86)

第二节 前代作家:主流意识的价值执守	(98)
第三节 后代作家:多义与超越的选择	(105)
第五章 陕西地缘文学的主流意识	(114)
第一节 时代精神的艺术共构	(114)
第二节 主流意识:显性与隐性的转换	(121)
第三节 作家心态:地缘心理与文学精神的涵融	(129)
第六章 陕西地缘文学的人生样态	(139)
第一节 人生样态的地缘学界定	(139)
第二节 地缘样态与民族精神的呈现	(147)
第三节 地缘样态与时代风尚的多元	(155)
第七章 陕西地缘文学的人文关怀	(162)
第一节 人文关怀的渊源史线	(162)
第二节 地缘个案形态:人文关怀的传承	(170)
第三节 地缘个案形态:人文关怀的拓展	(180)
第八章 陕西地缘文学的审美风格	(195)
第一节 地缘特性与文学观的生成	(195)
第二节 地缘文学的风格审视	(198)
第三节 地缘文学审美视域的缺失	(210)
第九章 陕西地缘文学的作家传承	(221)
第一节 “柳青经验”的后世烛照	(221)
第二节 “路遥范式”的精神承载	(226)
第三节 “贾平凹现象”的文学意义	(235)
第四节 “陈忠实视野”的艺术之髓	(260)
第十章 陕西地缘文学的格局建构	(271)
第一节 得天优势与后续嬗变	(271)

第二节 乡土叙事与农民人权	(276)
第三节 病象把脉与未来格局	(283)
第四节 劲旅换代与强势消长	(291)
参考文献	(298)
后记	(304)

导 论

陕西地缘文学的学科构图

本章以“陕西地缘文学的学科构图”为题，旨在论述三个层面的问题。第一，陕西的版图、文化艺术和呈现出的人文精神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应有位置，昭示着普泛意义上的秦人和职业意义上的代际学人之“陕西意识”、人文精神的织入与承续。第二，提出“地缘文学”通观大视域概念，融合陕西特有的地缘生态根脉，将区域表层的物质文化形态伸展到深层的精神文化形态，以发掘陕西地缘文学资源，集纳民族智慧，倡扬民族精神。第三，界定 20 世纪陕西地缘文学的历史分期，对相互胶裹又形态各异的四个段界内的文学特质，作历时性史线描述，并从学科构成的角度予以学理的观照。

第一节 版图、文化、精神的鼎立

正如人类社会有许多举重若轻之事理一样，问题的提出，仅出于教与学的不经意之中。随着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大学生的传统择业理念在逐一解构。一批在父母抚养下习惯于守土供职的陕西的“乖乖娃”“小棉袄”们，背起行装离乡他去，赴任建业。这一行为，从表象看属于个体皮囊在动移，即肉身的流动，然而实质却是本土文化流向的携带者。既为文化，就必然有本土文化与他乡文化在许多事象认识上的冲撞与涵融。问题的存在，使身处异地文化氛围中的陕西学子，甚感短缺本土学识的尴尬与窘迫，进而无以言对两种文化何以融通的茫然与苦恼。近年来，学子中仍存念想者，时有电函垂询关于陕西文学方面的资讯。学子们的目的显然功利，但很实际。试想，一个来自文学重镇的陕西学子（非陕西农人、商人、匠人、闲人），对本土文学却胸无点墨，其汗

颜之难堪岂不悲矣。于是，出于师者的授业解惑之责，不仅有了表层意义上给陕西学子补课的话题，更产生了从深层意义上思考陕西地缘文学本身的生命特质、审美形态、价值体系、历史生成和盛衰因由等复杂生动的精神形成史的过程。以便诸多秦人和学子们能织入陕西意识，承续文学精神，以此为生命之脉源，使其在社会化过程中的基本潜质更为深厚，更好地具有参与和谐社会构建的陕西人独有的良好素养与学养。

一 陕西：中华版图之重

不知何时何地因何人，绘制了酷似“金鸡晨啼”状的中华版图疆域线。这个蕴涵着巨大历史质涵的问题，远非笔者之微力所能考详。这里只是说，在版图内镶嵌着的数省辖区，陕西的位置尤为重要，如雄鸡之“腹”。故有“世界地心在新疆，中国地心在陕西”之说。地理学之谜无须溯究，现实位置的序次须得看重。因为缺了它，犹如版图开了窗，怎么得了？即使女娲降世，也无可奈何。的确，陕西之于中华，有太多的话题。历史根系源远，文明血脉流长，笔墨实难尽显。但是，若择其要，可否以“五个位置”来解释陕西于中国版图之“重”呢？这就是地理学位置，历史学位置，政治学位置，文化学位置 and 经济学位置。而地理学位置有着中华族类土地生根的意义，当为其要。

作为地理学位置的陕西，凸显着奠定中华版图基石的显在意义和潜在价值。除上述地心之说外，国人惯称为“中华民族和华夏文化的发祥地”。那么何为发祥地，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创世、起源、兴起、生发、扩展这样的开元基质。也就是说，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华族人，从这里——陕西版图的草蒿绿水、乡土山野间繁衍成众，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这一华夏族类的创世神话，文明史迹的生发演绎，竟是那样不可思议地从你的脚下发源，延伸……当你面对肃穆的轩辕始祖，当你驻足常羊山，聆听着神农炎帝“金剑劈石”，“尝百草而身亡”的撼天惊地的悲壮历史回声时，你可曾感到这就是我们神勇而又惜民的先人，聪颖而又智慧的先祖？他们是那样的遥远而无以膜拜其伟力，却又仿佛近在眼前能触摸到其伟岸身躯。一切华夏文明的血脉由此散开，向四面溃渗，向八方融通，织入到中华版图的每一根神经。

先祖的创世，缔造了五千年的文明，为后人的生命承续提供了最佳

生存的物质与精神依凭。于是，才有了2100年前华夏族类最早的“改革开放”（丝绸之路）的构想与实施，才有了历时1180年的“秦州自古帝王都”的13个王朝的盛世演迹，才有了当下被国人视为农业重镇、国防重镇、能源重镇、经济重镇、旅游重镇、文化重镇以及科技教育重镇的多资源、多利用、多效益的综合性内陆要地。如此说来，后世的辉煌，无不得益于先世智慧的馈赠，得益于这块神奇土地的暗佑。作为中华西部的陕西，纳藏着华夏国运的诸多机巧和灵气。有资料曾这样描述，西北在奇门遁甲秘术中居为“天门”，西部为“乾部”，属于八门中的两个“吉门”之一。“天门”为正，“乾部”居中，集吉、祥、瑞、仙之灵气为一体，统帅他部，合为天体。《周礼·大司徒》曰：“天不足西北，无有阴阳，西北为天门。”是说“天”的概念不能没有天门这个西北。《神异经·西北荒经》中更描述了西部的仙灵之源：“西北荒中有二金阙，高百丈，上有明月珠，经三丈，光照千里。”于是，荒漠之中，金阙矗立，明珠光焰，凭西东照，顿辉千里，瑞祥之灵气，使国运气脉灿然不衰。就陕西地貌而言也不乏诡谲，国人向来视高为“吉祥”，低为“阴晦”。位于西北的陕西地貌总体上西高东低，在客观上形成了山川凭西东俯，宛如人之骨骼以贯肌体，河流亦西源东泻，犹如人之血液以润经脉，华夏国运气脉也由之昌盛兴崛。因此，这些描述虽然富有美好象征意味，但事实上，中华之强盛王朝莫不囿于“乾部”西北，择都于陕西长安。这说明，作为内陆腹地的陕西的确有着中华版图之重的道理。

二 陕西：民族文化之魂

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华夏文化，因炎、黄二帝在陕西的出生与活动，昭示着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的源头。从此，民族文化之魂在陕西已成定论，陕西也因此博得了历史文化高台之谓。这一涵指，我视为姜炎、周秦、汉唐文化精神的启承和延安文艺新质的内化转合，一条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之魂的逻辑传承史线，这是他地域不可比争的历史馈赠，蕴涵着民族的许多历史辉煌和文明神话。如蓝田猿人、半坡遗址、农耕文明、西周青铜、周公礼制、丝绸之路及汉唐艺术等无法言尽的文化事象与物象。所谓“三千年历史看陕西，一千年历史看北京”正是简约的

概括。

首先,姜炎文化作为民族文明的创世,对于后世文化的融通至少有三种源头:文化与人类生息的休戚关系;农耕文明制导的重农文化意识;书写农事关注农人的初元心理定势。早先居住在渭河姜水(宝鸡)一带,代表姜炎文化的始祖首领神农炎帝,以“咒鸟识谷”、“百草医用”、“日中为市”、“斫木为耜”、“削桐为琴”等一系列教民劳作的体现生命延续意义的作为,使早期逸散流动族类的渔猎游牧生存方式,逐步定型为以农耕为主的理念。并在渭水和黄河中下游区域形成了中国早期的粟作文化圈。这一壮举从根本上确立了农耕为本的民族生存观,给后世的延续提供了诸多发展机缘。如大禹治水的开创,井田制的施行,都江堰的修筑,丝绸之路的开拓,大运河的贯通,酈道元《水经注》的科考,贾思勰《农业百科全书》的撰著,王小波“均贫富”的提出,毕昇印刷术的应用,张衡地动仪的发明,沈括《梦溪笔谈》科学史的问世,以及数学奇才祖冲之、水利学家郭守敬、纺织能手黄道婆、药王孙思邈、名医扁鹊等各类科技人才的辈出。尤其是当代的南水北调,西气东输,三峡大坝,“三农”意识等等源自农耕文明的历史新开元均令人瞩目。有道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发生在陕西版图上的姜炎文化之魂,已为历史所铸定。

其次,如果说姜炎文化传承的是先祖深邃的人文精神,那么周秦文化便呈现出民族的进取精神和开拓精神。生活在陕西关中渭北高原上的弱小周人部落,凭借自身的顽强进取,推翻了殷商王朝,完成了西周大业,使炎帝草创的农耕文明再显光彩。尤其是周人的礼乐文化,对民族性情的陶冶,社会秩序的规范,其治国之法、教民之道、理家之范的作用,于当世和后世都显示了应有价值。这就是说,周人之强盛,是仰仗外显行为的进取与内在文化的渗透之合力所致。而秦人的开拓精神似乎更胜一筹,摆脱了受制于他族的困境,而“灭国十三,开地千里,遂霸西域”,于荒蛮之地迅速崛起。秦始皇时代则显示了“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的帝王霸业气概。作为一代开拓君主,秦始皇既敬重先祖的功德,又不畏怯于此,大有超越先人之能。因此,自封为“始皇帝”。这种观人论世的务实思维,典型地体现了秦文化中重实效的功利性价值取向,使得秦人脚踏实地一举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帝国。历史的

延续本就如此。周人的进取精神和秦人的开拓精神,无疑在后世文化中衍生出了许多诸如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忧患意识、民族意识等概念,这是先世与后世文化的烛照与回应。

再次,灿烂的汉唐文化,其精髓在于创造了有史以来的中西多元艺术的融通。汉武帝远见卓识,力主文治,以其超前的文化观建立太学,聚拢太学教授于关中著书立说。其中韩城博士司马迁,扶风教授班彪、班固、班昭,城固使者(外交官)张骞尤为众里显尊。加之万里丝绸之路的开拓,贯通了中亚,给古老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许多粹质。而唐代更为活跃的艺术氛围使地域间、民族间均以长安为中心,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文化交汇的峰巅。这里人才荟萃,艺苑似锦,风格体式各尽其妙。不但有一代浪漫诗仙李白,现实诗圣杜甫,而且有田园诗人王维,民间取向诗人白居易;不仅有“秦府十八学士”、“大历十才子”、“唐宋八大家”这样的民族文化饱学高士,而且有兼收异族异国之长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等。如此,博大精深、多元并存的汉唐文化,与前朝的辉煌一起,又一次提升了伟大民族文化精魂的基质。

最后,发生在陕西境内的延安文艺是民族文化的新史再造。它承续了苏区文艺、左翼文艺的品格,合成了以工农兵为主导,以革命文学的战斗性为指质,以激进的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文艺特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阐述的文艺新方向命题,确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新体系。延安文艺,产生于民族非常时期,决定了它必须保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并从本民族历史文化中汲取重振民族精神的动力,以抵御外来侵略。所以,民族精神的凝聚力、向心力是延安文艺的核心,并由此制导着中国20世纪文化中许多关于时代本质、主流意识的新理念。综上所述,姜炎、周秦、汉唐文化精神的启承与延安文艺新质的内化转合,的确构成了民族文化之魂的逻辑传承史线。其荣光属于陕西,陕西亦无愧于中华。

三 陕西:共和国精神之脉

共和国时代脉搏与陕西文学,如同母子连脐不可分割,是娘胎孕育。早在20世纪40年代,陕西学界的第一代作家就沐浴在延安文艺的氛围中。有的甚至还未成年,如12岁的“红小鬼”李若冰,17岁的杜

鹏程，貌似成人的 21 岁的王汶石，22 岁的柳青。他们在民族解放的时代战火中淬砺，革命、奋斗、奉献是他们的人生目标，贴近时代，为之鼓呼，从革命到文学是他们的创作追求。在倾力于文学新方向的实践上，确立了以延安文艺新的民族文化圈为主导的文学家身份。诚如领军人物柳青所坦言：“先革命，后文学，当你身在其中了，创作的动机也就来到了。”^① 杜鹏程则觉得：“要说我有一点长处，那就是不忘本，这个本就是革命与精神。”^② 王汶石“要把笔墨献给新生活，复制出无产阶级新人物”^③。李若冰深深感到“手中的这支笔，就是人民发给自己的一支枪”^④。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似乎都在阐述着同一问题：即使时代转换，共和国精神之脉在陕西依然跳动，文学使命在陕西依然神圣，主流意识在陕西依然高扬。他们与时代同步，高擎着陕西文学的别样旗帜，用并不十分强健的肩膀分担着共和国大业的哀乐。

这里有恋着秦地黄土的文学“愚人”柳青，50 年代放着文化前台北京的优厚生活条件不享，却执著地由京而秦，再长安，再皇甫，14 年如一日。演绎着一位地道的关中明理“老汉”的生命史线，书写着社会主义初期艰难的“创业史”迹，毫无保留地倾注着他的一腔热血。记得有位单干户宋志让，因一时糊涂未入社，家人受不了单干的孤独而一齐攻击他，老汉低头叹气，大滴眼泪掉在地上。柳青目睹此状在文章中深情地写道：“哭吧，宋志让，用你的眼泪送私有制的终吧！”^⑤ 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宋老汉未入社而苦恼的惋惜之情。就是这位“愚人”，于 50 年代末期，拒不领受在别人眼中视为巨款的《创业史》稿费 16065 元，而毅然决定全部充公。这位大气但并不富裕的人，心里装着万众，唯独少了他一个。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着他如是做，是时代的奉献精神。这里还有“苦才子”——一位来自司马迁故里的、少小离家寻求革命的文学家杜鹏程。一生苦苦寻觅文学何以融通时代精神之脉的方略。当解放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去，他便以紧迫的使命感描绘着“保

① 柳青：《生活是创作的基础》，《延河》1978 年第 5 期。

② 杜鹏程：《保卫延安·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22 页。

③ 王汶石：《风雪之夜》，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82 页。

④ 李若冰：《高原雨丝》，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 页。

⑤ 《柳青小说散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5 页。

卫延安”的一场场历史决战；当中国革命发生转折时，他又以敏锐的目力，拴挽住时代的潮头，没做过多的间歇和停留，闪现在共和国的建设工地，并以“皱着眉头看生活”的冷峻思考提出了“在和平的日子里”所面临着的种种问题。涉及战争和建设两种生活，也就是说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两大时代命题上，杜鹏程是连接两个时代精神的忠实实践者，与共和国同脉。不可忘记那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一次会议的间隙，周恩来总理接见了陕西作家李若冰。见面后，总理一愣说：“噢，你很年轻啊。”^① 总理怎能想到，眼前这位写尽共和国初年西北拓荒者足迹的大漠骄子李若冰，竟是这般年轻有为，与他那苍劲、老辣而又饱和着深情的文笔很难印合。是的，当时年仅 30 岁的李若冰，取名“骆驼铃”。新婚过后便出玉门、过昆仑、走沙漠、进戈壁，六进柴达木，心系大西北，从风华正茂到年岁花甲情未了。共和国精神之脉，就这样从柳青到鹏程，再若冰，再路遥……辈辈相传，代代不绝，以至于愿为文学殉身，甘为精神殉道。“只有永远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才有可能把握历史进程的主流”，“像牛一样的，像土地一样的贡献”^②，路遥如是说，更如此做。这位生长在陕北一个贫困农家的孩子，一位从偏僻小城的 16 开《山花》小报起步的文学青年，以满腔热情应和着共和国精神之脉，最终走上了中国文学最高荣誉的领奖台。可是，他却为此身心憔悴，心血耗尽，42 岁英年早逝，给文坛留下了几多悲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陕西版图，流淌着共和国精神的涓涓血脉，或时间或暴力无以冲刷，它依然鲜活着！

第二节 地缘文学与通观视域

之所以提出“地缘文学”这一学科新概念，并非因近年地域文化热的缘诱，而是陕西文学的研究，一直以来在单一的平面视角维度，单纯的线性空间维度和单个的作家作品阐释维度中悬置与裹足，使其应有的地缘维度与精神维度之张力难以扩展，研究呈“悬置状”。从这个意

① 《永远的诗人——李若冰论集》，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12 页。

② 《路遥中短篇小说·随笔卷》，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29 页。